



田雪原 主编

中国民族人口

中国人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人口 (四) / 田雪原主编. —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5.11

ISBN 7-80202-140-5

I. 中… II. 田… III. 少数民族-人口构成-中国 IV. C92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822 号

中国民族人口 (四)

主编 田雪原

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41.25 插页 4
字 数	1 39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2-140-5/C·266
定 价	260.00 元

社 长	陶庆军
电子信箱	chinaphouse@163.net
电 话	(010) 83519390
传 真	(010) 83519401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政编码	1000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问题 随时退换

加强人口理论研究
促进民族共同繁荣

为《中国民族人口》丛书题
辛一月十日 布赫



مىللى مەدەنىيەتنى گۈللەندۈرۈش،

مىللەتلەر ئىتتىپاقىنى ئىلگىرى سۈرۈش.

خۇمۇرداۋاس

2002 - يىلى 1 - ئاينىڭ 11 - كۈنى

繁荣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

铁木尔·达瓦买提

2002年1月11日

加强民族人口研究
促进民族事业发展

彭珮云

二〇〇二年一月

弘揚民族優秀文化
提高民族人口素質

費孝通



二〇〇三年一月

《中国民族人口》(第四集)总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彭珮云

顾 问： 张维庆 李德洙 潘贵玉 王国强 杨魁孚 李宏规

主 编： 田雪原

常务副主编： 高春燕

副 主 编： 陈胜利 陶庆军 马正亮 黄荣清 金星华 王铁志

编 委： (按姓名笔画排列)

刀爱民	马正亮	马自祥	马合木提·吐尔逊	马博华	
王玉希	王成勇	王素银	方军雄	艾山·阿尤甫	
石开忠	田雪原	央吉	白振文	冯裕生	司秀
吕文怀	吕昭河	乔亨瑞	朱尼	朱建琨	刘大红
刘芝兰	齐文礼	牟廉玖	孙霖	杨宗传	杨新科
杨照辉	李宏规	李宏国	李根	李敏	李德滨
肖永孜	吴生银	邱立	邸少坚	汪文焕	沈斌华
宋传升	张玉明	张克勤	张晓松	阿米娜·吾守尔	
陈耀之	武友德	林盛中	林擎国	岩峰	罗铁
罗淳	和耀云	金照昀	周建华	孟宪德	柳文
赵钟岳	赵晓彪	施小梅	格桑顿珠	莫国芳	原华荣
徐八达	徐天琪	徐进	郭大烈	郭长乐	高春燕
陶庆军	黄荣清	曹景椿	龚永辉	梁振廷	续西发
韩贵仁	葛丰交	董永茂	董殿华	普布卓玛	谢明道
詹长智	鲜鹏	滕久明			

《中国民族人口》(第四集)

新疆七个民族人口分卷总编:阿米娜·吾守尔

第三十六卷《维吾尔族人口》

主 编: 续西发

第三十七卷《哈萨克族人口》

主 编: 董永茂

副主编: 努拉力·阿不力哈克 房若愚

第三十八卷《柯尔克孜族人口》

主 编: 方军雄

副主编: 刘贺兰

第三十九卷《塔吉克族人口》

主 编: 马合木提·吐尔逊

第四十卷《俄罗斯族人口》

主 编: 葛丰交

副主编: 姜 勇 永梅兰

第四十一卷《乌孜别克族人口》

主 编: 齐文礼

副主编: 古丽·巴哈尔 房若愚

第四十二卷《塔塔尔族人口》

主 编: 周建华

副主编: 周 泓

序

彭珮云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中,汉族人口115 940万,占总人口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10 643万,占总人口8.41%。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比较,汉族人口增加11 692万,增长11.2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 523万,增长16.70%,高出汉族5.48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高于汉族,体现了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的特点。

人口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人口数量的变动、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又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对20世纪中国各民族人口状况作一个总结,留下具有时代意义的记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民族人口研究列入“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不言而喻,要对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别进行符合人口学要求的研究并撰著成书决非易事,特别在缺乏专门研究人才、资料和经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主编、副主编、编委和众多作者不辞劳苦,深入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方调查,冒着酷暑严寒坚持写作。“功夫不负苦心人”,继《中国民族人口》(第一集)、(第二集)和(第三集)出版之后,以世居在新疆为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中国民族人口》(第四集)出版。这里,我谨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而付出辛劳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继续控制人口的同时,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注意调整人口结构。无论是人口数量的控制,还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都同各民族密切相关。《中国民族人口》系列专著的出版为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打下了基础,开了一个好头。我诚恳地希望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深入实际,潜心研究,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为推动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推动人口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绪 论

列入全国社科规划并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中国民族人口研究”，继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成功推出三批最终成果《中国民族人口》(一)、(二)、(三)之后，如今第四批最终成果《中国民族人口》(四)，也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一集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共7个民族，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劳动新的结晶。其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汇总资料公布，一些民族人口撰写中得以采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从而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民族人口》(四)，具有一定的与时俱进性质，也给以后几集的撰著增添了新的活力。

“民族”一般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并以相近经济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人的群体。“民族”由“民”与“族”合成。“民”即人民、大众之意；“族”则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据考证，“族”字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曾出现过，古代通“𩑦”，即箭头，后在“矢”、“丛集”之意上推演引申，赋予聚众、群众、聚集意义，表达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人的群体，形成亲族、家庭、氏族、王族、宗族等概念。显然，这里的“族”不是民族的概念，古代的民族直称羌、狄、夏、番、匈奴、女真等，均不加“族”；如加则加“人”或“民”。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民族”一词才开始出现；但意义并不确切，常同“种族”、“人种”等概念交织在一起。进入20世纪后，“民族”涵义逐渐清晰起来，应用也多了起来；不过仍与“民”、“人”混用，既称某某族，也称某某民、某某人。后来由于“民族”一词的高频率使用和广泛地应用，意义的进一步明确，一提“族”很自然地想到“民族”。但是作为具有某种相同属性的事物——人类总体的“族”，有着更为宽泛的涵义，如“水族”、“芳香族”，“上班族”、“追星族”等；“族”只有同具有共同语言、共同

文化并以相近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人口和人种联系起来形成的人群，才称得上我们所说的民族。中国56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较，在数量、素质、结构变动中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制约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因而研究民族人口，对于推进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有着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提前起飞”与提前进入低生育水平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现在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追溯到距今210万年以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口同世界人口相似，长期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无从考证，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历史文献表明：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全国人口约1355万；西周(前1046～前771年)增至1372万；春秋(前770～前476年)减至1185万；秦统一中国期间(前221～前207年)，人口在2000万左右。其后，随着朝代的更替，人口呈现波浪起伏式增减变动，一般是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往往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人口明显增加；到了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加剧，战乱和饥荒不断，人口又有所减少。到了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口开始稳步攀增。不过增长最快的是清代。清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总数达到14341万，揭开了中国人口史上新的一页。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增加到20047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增加到30148万，而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增加到41281万。^①中国人口在18世纪30年代增加到1亿，在其后的100多年里接连翻了两番，于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超过4亿，形成“乾隆盛世”前后空前巨大的人口增长，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0%左右。而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世界人口由1750年的77000万增加到1850年的124000万，年平均增长速

^① 赵文琳、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刘洪康主编、吴忠观副主编：《人口手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度仅为 0.48%；1850~1950 年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达到 0.70%；只有 1950~1960 年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始提高到 1.03%，^①同上述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相仿。就是说，中国在 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上半叶，创造了世界 20 世纪前 60 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起飞”一个半世纪，从而奠定了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

对于中国人口在清朝“提前起飞”现象，可从封建王朝有关政策的改变和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有关政策方面，历史上自征收人丁税役起，人们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每每少报人丁，致使长期无法获得真实的人口数字，文字记载的数据距实际要偏低许多。清朝统一中国后，康熙于 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下令免除了按人头征赋税制度，^②户口人数统计彻底摆脱缠绕，使人口统计数字大大接近实际；同时“摊丁入亩”税制的实施，增人不增税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国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居民安居乐业，有利于人口增加；水稻种植的大面积推广和产量的增加，满足了人口增长对食物扩大的需求；医学主要是中医获得很大发展，虽然尚不能有效防治严重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但是治疗水平有较大提高，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显然，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提前起飞”的原因同欧美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增长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人口增长不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起，相反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情况下发生的，是有别于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的一种东方的特例。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双重袭来，军阀混战不断，人口数量变动陷入徘徊状态，至 1949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25%。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已经相当庞大，致使全国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高达 54 167 万，较 1840 年净增 12 886 万。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加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人口出生率却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人口再生产迅速步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形成了 1953~1957 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上升到 2.4%，其间人口净增加 5 857 万。1958~1961 年为一次生育低潮，主要受到国民经济 3 年困难时期死亡率升高的影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0.46%。1962 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随即出现持续达 11 年之久，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6% 的第二次生育高潮。1962~1973 年全国共出生 3 亿多人口，人口总数由 65 859 万增加到 89 211 万，净增 23 352 万，成为人口年龄结构中异常庞大部分，也是人口压力最为严重部分，这一部分人随年龄增长移动到哪里，中国人口问题的难点就在那里出现。尽管人口变动如此复杂，但在总体上处在高增长之中，1949~197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2.10%。人口增长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制约和负担的加重日益积累起来，终于使政府定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的决策。1972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在城乡人民中，要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1974 年在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两份计划生育报告批语中，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革命”，“要充分发动群众……把计划生育落实到人”，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由于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力度，1975 年以来又将其列入每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带动了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使人口控制的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不断获得改善，创造了中国人口变动的“奇迹”。人口出生率由 1973 年的 27.93% 下降到 1999 年的 15.23%，下降 12.7 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由 2.10% 下降到 0.88%，下降 1.22 个百分点。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有效地将世界 50 亿人口日的到来向后推迟 2 年，60 亿人口日向后推迟 3 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TFR）也由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5.8，下降到 1999 年的 1.9 左右，在 2.1 更替水平以下，母亲的净再生产率（NRR）下降到 1.0 更替水平以下，表明我国已经提前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所谓“提前进入”，是指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而论，我国处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而人口生产，则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

不过就全国 56 个民族而论，“提前起飞”和“提前降低”情形很不一样。两个“提前”主要是对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同汉族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民族说的，多数特别是居住边远地区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既谈不上第一个“提前”，也同第二

①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94

② 吴希庸. 人口思想史（一册）. 北平大学出版社，1936

个“提前”无缘。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近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的生育率也下降了,缩短了与生育率更替水平之间的差距,创造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

二、较低的素质与跨越式的提升

人口素质有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二要素”论与“二要素”之外加上思想或道德素质“三要素”论之争,我们这里仅考察“二要素”的变动。

在古代社会,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上长期居于领先水平,人口素质水平也相对较高。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中国仍浸沉在往日的农业文明中,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及其后列强瓜分的一系列震撼,中国一步步跌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泥潭,广大民众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教育素质不能不受到摧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一般估计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出生时的人口预期寿命城市不到40岁,乡村在35岁左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低下,经过新中国15年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扫除文盲半文盲,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仅为288万,占12岁以上人口的0.42%;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人口912万,占1.32%;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人口3235万,占4.68%;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19582万,占28.33%;文盲半文盲(初识字、不识字)人口26340万,占38.1%。^①

但是由于国家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开展全民健身和体育运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扫除文盲和半文盲,使得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教育素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尤以改革开放以来提高十分显著。在身体素质方面,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婴儿死亡率已下降到32.9‰,出生时男女合计预期寿命目前已超过70岁。尽管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的估计有些出入,如联合国估计1990~1995年间在46‰左右,1995~2000年间在41‰左右,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席N·兹迪克估计1999年为38‰,^②均比中国的人口普查高一些;然而即使按照这些估计进行比较和衡量,中国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是异常迅速的。1950~2000年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从178‰降至63‰,50年中下降11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下降在150个

千分点以上,由原来高出发展中国家变动到现在低于发展中国家许多,正向发达国家的低婴儿死亡率靠近。与此同时,1950~200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从40.9岁提高到63.3岁,50年间提高22.4岁,同期中国至少提高在30岁以上,同样高出发展中国家许多,并以比较快的速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文化教育素质方面,一是文盲半文盲人口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8507万人,文盲率下降到6.72%,较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降低16.78个百分点。二是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所占比例急剧上升。2000年与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比较,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上升到14109万,所占比例上升到11.15%,升高4.88个百分点;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上升到42989万人,所占比例上升到33.96%,升高16.2个百分点;三是现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很快,2000年达到4571万,所占比例上升到3.61%,升高3.01个百分点。^③

需要指出,人口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的比较快的提高,是在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的情况下取得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更为显著一些。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汉族人口54728万,占93.94%;其余41个少数民族人口3532万,占6.06%。经1977年民族人口识别和认定,正式定为56个民族,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汉族人口115940万,占总人口91.59%;其余55个少数民族人口1064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8.41%,升高2.35个百分点。^④当然,由于过去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总体水平相对更低一些,因此虽然提高更快一些,但是目前同汉族人口总体素质比较仍有一定差距。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某些差距,归结蒂受民族居住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是社会发达程度的反映。

三、失衡的结构与谋求发展的平衡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年龄、性别自然结构,人口就业、城乡、地区分布等经济结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宗教等社会结构,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着人口的特征。结合我国民族人口实际,主要分析一下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汇编.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翻印,1986年9月

②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New York, 1998

③ 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年人口普查统计汇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口年龄、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

其一,人口年龄结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0~14岁少年人口下降到占总人口的22.89%,较1990年降低4.80个百分点;15~64岁成年人口上升到70.15%,较1990年升高3.41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上升到占6.96%,升高1.39个百分点。^①这次人口普查标准时间为2000年11月1日零时,到年底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应达到7.0%的水平。据此,老年人口比例、年龄中位数、老少比等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基本指标,均已达到或接近老年型年龄结构标准,2000年底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跨进老年型门槛。然而这是对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1个省市区和现役军人总体说的,分开来看则差别很大。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所作的抽样比为0.976%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99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63%——尽管这一数值比2000年人口普查高出0.67个百分点而显得偏高,但是作为省市区之间比较还是可用的——不过,地区间的差别是明白无误的。最高的上海市达到13.84%,其次北京市10.27%,再次江苏省9.83%,浙江省9.54%,天津市9.36%,其余在全国水平之上的依次为重庆市8.84%,山东省8.61%,四川省8.33%,福建省8.04%,湖南省7.98%,广西壮族自治区7.96%,广东省7.89%,辽宁省7.81%。在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全国水平的13个省区市中,除重庆、四川、湖南三省市为中西部地区外,其余10省区市均为东部沿海地区。相反,老年人口比例低于全国水平排列,依次为西藏自治区4.08%,宁夏回族自治区4.4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69%,黑龙江省5.42%,青海省5.46%,甘肃省5.60%,内蒙古自治区5.85%,贵州省6.05%,山西省6.41%,河北省6.60%,海南省6.63%,江西省6.71%,吉林省6.78%,云南省6.83%,河南省7.08%,陕西省7.14%,湖北省7.15%,安徽省7.43%。^②可见,老年人口比例较低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西部,中部次之,沿海地区仅有两个省低于全国水平。总体上东部已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已达到中期较高阶段;中部是过渡地带,一些省份进入老年型,另一些省份正向老年型过渡;西部除重庆、四川2省市外,处在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阶段,基本上属于成年型,西藏、新疆2个自治区属于由年轻型刚刚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尚具有年轻型的一些特征。据此,可将目前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变动划分成“三大平台”:西部以成年型为主,总体上还具有较强增长势能;中部呈老年型与成年型“二元结构”交叉型,成年型结构省份将很快步入老年型;东部以老年型为主,一些省市老龄化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个别成年型省份也将很快步入老年型。这种情况表明,汉族人口则基本达到老年型,少数民族人口则基本处在成年型。不过不能笼统而论,以世居在东南沿海为主要的某些少数民族,其年龄结构也已步入或接近老年型;而世居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年龄结构相对要年轻一些,增长的势能强一些。

其二,人口城市结构。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市镇人口所占比例达到36.09%,比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30.90%升高5.09个百分点,有人对此抱有疑虑。我以为,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因为此次人口普查将长期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镇的人口列入市镇常住人口,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人口现实。过去始终受户籍管理束缚,主要以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划分城乡人口,而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又以是否享受国家按定量标准供应商品粮为转移,造成城乡人口与实际不符。加上设置市镇标准的多次调整,形成1949~1960年城市化发展较快,六七十年代的徘徊,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总体上看,以往计划经济和行政色彩浓厚了一些,公布的市镇人口数据偏低了一些。对此世界银行1984年在中国经济考察报告中称:对于数千人口的集中区,许多人从事的是非农业劳动,然而却将他们定为农业人口很不理解,当时即估计中国市镇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34%左右。笔者赞同以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考察,包括行政管理区域、人口集中程度、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基础设施条件、文化生活方式等划分市镇人口,不过人口集中的程度具有基础的性质,据此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36.09%的市镇人口比例并不为高。不过这是全国的比例数据,分地域观察则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研究民族人口结构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目前总的情况是:经济比较发达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就高一些;经济不够发达和工业化程度差一些的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就低一些,发展就滞后一些。大致上自西向东,形成人口城市阶梯式分布格局,逐步走高。这有几方面的

①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表现:一是市镇人口所占比例自西向东逐步升高,东部沿海某些省市城市人口已超过 50%,西部某些地区还在 20% 以下。二是在大中小城市结构上也有所表现:西部较小城市(含镇)所占比例更高一些,大城市和较大城市所占比例低一些;东部则倒了过来,较小市镇所占比例低一些,大城市和较大城市所占比例要高一些。这种城市化结构状况反映到民族人口结构上,汉族市镇人口比例相对更高一些,市镇人口中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口比例也相对高一些;少数民族市镇人口比例相对低一些,小城镇人口比例相对高一些。因此,谋求民族人口平衡发展,适当加快中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是一种带有战略性的举措。

其三,人口地区分布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结构同民族人口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世居在地广人稀的高山、高寒地带,从而形成我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三大平台”:1999 年西南、西北 10 个省区市人口 28 771 万,占全国 22.85%,人口密度(人/ km^2) 52.7;中部 9 个省区人口 46 031 万,占全国 36.56%,人口密度 162.2;东部 12 个省区市 51 107 万,占全国 40.59%,人口密度 393.1。^① 需要指出,“三大平台”式人口地区分布由来已久,其成因主要是:

第一,自然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进行繁衍生息的场所,是人口再生产得以进行的空间条件。不过人类发展的历史越往前追溯,依赖自然环境因素越大,甚至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环境变动的产物。历史越往后推移,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便越小,但是仍不失为影响人口生产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表现为:

一是地质构造和地形因素的影响。由适宜耕作土构成的平原,石英砂组成的荒漠,岩石结构的土地显然承载人口的数量大不相同。冰雪覆盖的高山不适合人类居住,山地雪线以下一般方可生存,但生存数量与等高线呈反比,1950 年世界的情况是:海拔 350 米以下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28 人,350~750 米为 11.5 人,750~1 250 米为 5.3 人。在我国 960 万平方千米土地中,山地占 33.3%,高原占 26.0%,两项相加占到 59.3%。而西北、西南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最高的几座山脉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等都雄踞西部,并有横断山、祁连山、秦岭、大巴山等连续向东南延伸,形成以青藏高原为依托的“世界屋脊”。北部则有阿尔泰山、阴山、大小兴安岭等山脉,虽然高度远不能同青藏相比,但是架起

了内蒙古高原,构成了北高南低的走向。按照人口“等高线分布”理论,是造成西北部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

二是气候因素的影响。光照和年积温差别很大:华北平原年平均积温在 4 000~5 000℃ 之间,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在 5 800~8 000℃,而青藏高原和黑龙江北部只有 2 000~2 500℃。年积温过低、光照不足、无霜期短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人类生产活动,一般人口密度较低;降水量差别很大:西北内陆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100~200 毫米,按人口分布“等高线”划分,本来可以居住和生存更多人口的塔里木、柴达木盆地等,因年降水量在 25 毫米以下,主要靠积雪灌溉,严重限制了居住人口的数量。全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占到全部国土面积的 53%,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成为那里人口密度低的主要原因。

第二,自然资源因素的影响。土地特别是耕地,被称为人类生存的命脉。西部地区平原少,耕地多为丘陵和山地,或处于高山高寒地带,或者水资源缺乏,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很低。东部有东北、华北两大平原,以及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长期形成的冲积平原,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利于农作物生长,人口十分集中,形成高人口密度区。介于西部和东部之间的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平原和山川河谷地带人口相当集中,丘陵和山地人口则比较稀疏,土地的决定性作用更为突出。

此外,西部地区森林、草场资源不少,但是由于缺少雨水,草原畜载量不高。中国江、河、湖、海面积广阔,沿水域周围为人口集中区,特别是较大城市多位于河流要道和沿海口岸。西北部地区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和开发利用的条件限制,除少数地区矿山、冶金比较发达外,并没有形成众多工矿区吸纳大量人口的现象,不足以改变人口地区分布的格局。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人口的地区分布是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结果;同时这种积淀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特定地域人口—经济—社会的互动组合。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农业资源首先受到开发和利用,人口地区分布首先表现为农业经济发展的积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开始启动,出于对各种矿产资源的需求,西北部一些地区开发石油、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矿

① 中国统计年鉴 2000

产,有的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吸纳了部分外来人口,不过总量有限。

进入70年代后期,随着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80年代中期以来中西部农村过剩人口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推——拉”理论作用下,大举“孔雀东南飞”。这点比较一下沿海和中西部农民家庭纯收入的差距便会一目了然,1978~1999年东部沿海农民家庭纯收入增长20.4倍,同期全国增长16.5倍,中西部增长13.4倍。

除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人口的集中程度外,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指政治、军事、国家行政中心及其辐射力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盛唐建都长安,开辟丝绸之路,这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之路,交往之路,带来了西部地区的一度繁荣,人口增加很多。但随着后来朝代重心的东移,宋朝迁都开封、临安(杭州),元朝以后定都北京,占据华北平原,人口也随着转移,一步步形成现在的格局。从发展上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有上升的趋势,但在科技进步没有达到对自然环境改造产生革命性变革之前,譬如能使沙漠变良田,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那么改变人口分布失衡的梦想就无法变成现实。因此,中国西部、中部、东部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是基础,它制约着人类的产生和生存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是调节器,在自然条件和人口生产之间起着协调的作用,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创造适合人口居住和生存的环境;人口密度则是这种协调能力的指示器,提示调节的方向,调整人口分布的格局。不过迄今为止,其调节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百年依旧的分布格局难以改变。了解到这些,也就了解了中国人口地区分布和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变动趋势作出合理的判断。

四、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中央在世纪之交提出西部大开发,为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新的格局,也为人口相对集中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弄清西部的资源配置状况,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沿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向走下去。

1. 资本结构现状。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用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评价财富的理论方法。目前西部10省、区、市“四大资本”状况,概

要如下:

自然资本。土地面积546.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的56.9%;人均耕地90年代中期全国平均1.7亩,西部仅四川、贵州2省略低于这一水平,其余则高出这一水平许多;人均水资源西南除重庆市外,均大大高出全国人均2221.2立方米水平,最高的西藏高出全国人均水平80倍,居全国之冠;人均生物量仅重庆、宁夏、贵州3市、区、省低于全国水平,其余高于全国水平,尤以西藏、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区为高;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22723亿元,占全国57288.9亿元的39.7%,四川、云南、贵州3省名列前茅。从总体上看,西部自然资本积聚较多,蓄势较强,开发潜力较大。不过也要作具体分析。如耕地中质量较好的一、二等耕地所占比例较低。目前只有云南、新疆2省区高于全国占76%的水平,其余均低于这一水平,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和重庆等省市区仅占50%或50%以下,高山、高寒和干旱、半干旱耕地居多,耕地的利用率和效率不够高;人均水资源西南与西北一多一少严重“苦乐不均”,宁夏、甘肃、陕西等省区成为我国严重缺水地区^①。

产出资本。1998年西部10省区市国内生产总值11552.1亿元,占全国79395.7亿元的14.6%;人均4051.9元,占全国人均6361.3元的63.7%。资本形成总额5153.9亿元,占全国30396.0亿元的17.0%;人均1807.8元,占全国人均2435.4元的74.2%。非农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75.7%,比全国占81.6%低5.9个百分点。^②西部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均低于全国水平,有1/3省区仅及全国水平的一半左右。总体水平低、蓄势较弱、与东部地区比较差距拉大是西部产出资本的显著特点。

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相对于物化资本而存在,表现为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经济、健康等人口质量素质的总和,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本。1998年西部地区人口28510万,占全国124810万的22.8%。6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18.0%,比全国占13.7%高出4.3个百分点;小学占44.5%,比全国占39.8%高出4.7个百分点;初中占26.7%,比全国33.0%低6.3个百分点;高中占8.6%,比全国10.7%低2.1个百分点,大专以上占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同上

2.2%,比全国2.8%低0.6个百分点^①。以意义为平均所受教育年限计算的人口文化教育指数,西部地区为5.66,比全国6.29低0.63。总起来看,如以 E 代表人力资本积累量, T 代表人口数量, Q 代表人口质量(Q 可分解为: i 人的知识, t 人的技能, e 人的经验, h 人的健康水平),则:

$$E = T \cdot Q = T \cdot (i + t + e + h)$$

若暂不考虑 h 健康因素, i 、 t 、 e 集中反映在人

口所受教育程度上。将上面人口文化教育指数代入1998年西部10个省区市人力资本积累量为161 181万人年,占全国人力资本积累量785 055万人年的20.6%。这一比例比人口数量所占比例低2.2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平均所受教育年限较低。

将上述主要数据汇成一简表,西部地区的资本结构便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现出来:

1998年西部地区资本结构

	土地 (万 km ²)	人口 (亿)	45种矿产资源 (亿元)	资本形成额 (亿元)	GDP (亿元)	文化教育 指数	人力资本积累 (万人年)
西部	546.2	2.85	22 723	5 154	11 552	5.66	161 181
全国	960.0	12.48	57 289	30 396	79 396	6.29	785 055
西部占全国(%)	56.9	22.8	39.7	17.0	14.6	90.0	20.6

该表表明,从总体上观察,西部地区自然资本蓄势较强,不过不要忘记,一是较强只能是相对而言,而且强中有弱;二是自然资本在西部各省区市之间,分布也很不平衡。产出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弱,同自然资本不相匹配,阻碍着西部的发展。至于市场化程度、管理水平、改革开放力度等社会资本相对滞后,已是人们公认的不争事实。笔者以为,弄清西部地区资本结构现状非常必要,它是开发的客观基础和如何开发的基本立足点。

2.人力资本“瓶颈”。出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的需要,国家组织区域性经济开发,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从中国古代的成边屯田,到近代美国的西部开发,前苏联的远东开发就是例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西部开发也已有过两次,“一五”时期和后来的“三线”建设。这些区域性经济开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根本在于能否形成融资金、人才、物资、技术、信息于一体的“能量流”。所谓开发,开垦发展之谓也,即通过外界注入该“能量流”启动当地资源而造成持续发展的态势。就当前我国的西部开发而言,就是要通过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启动蓄势较强的自然资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发展态势。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资本的注入积累都是必要的。以产出资本价值形态出现的货币资本的注入和积累是必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舍此则自然资本难以启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实行必要的政策倾斜等社会资本的注入和积累是必需的,无此也不能创造有利于开发的

社会环境;但是这两种资本都不能同人力资本并驾齐驱,人力资本是西部开发的战略“能量流”中的主流资本,制约开发“瓶颈”的资本。

要认识这一点,需对当前西部开发所处的背景和环境,尤其是同“一五”和“三线”建设时的不同情况,作出比较分析。首先,当前的西部开发同前两次开发社会经济环境有很大不同,人力资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前两次开发,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建设项目的确立到投产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均纳入严格的计划,加上当时又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没有销售不了的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争来项目和投资,成为能否开发和开发力度大小的标志。现在的情况则有原则上的不同:一是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让位于以市场主体法人化、要素流动市场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二是经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的快速发展,经济运行有了明显改观,短缺经济已不复存在,如今主要消费品已经形成买方市场。经济大环境这样两点带有根本性的改变,决定了当前的西部开发不能走“一五”和“三线”建设的老路,不能把开发视为就是争来项目和投资。应当承认,开发离不开一定的建设项目和投资;但是建设项目和投资不仅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本优势上,还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立足于建设项目投产后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有无充足的市场销路,而且还要考虑到开发建设工程的成本与效益,在同类产品中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上马的开发建设工程生产的产品市场上没有多少销路,或者虽有销路但生产成本很高或质量较差,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样的项目上马后短期内可能显现“开发效益”(实施开发的“政绩”);时间一长因经济效益不济或亏损日益严重而被市场淘汰,弄得不好还要破产,反倒成了继续开发建设的包袱,转化成“负开发效益”。如何避免这种负效益并提高开发的正效益呢?除了在选择开发项目上要作好市场调查和科学论证外,必须明确,提高开发项目建设和投产后的效益,关键在人力资本的积聚。只有具备项目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有效降低成本,才能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这一点甚至在计划经济下的“一五”和“三线”建设西部开发中,也有所体现。这两次开发投资建设不少项目,有些项目已经发挥良好作用;但是确有不少项目上马不久即成为“下马工程”、“胡子工程”和人去厂空的“留守工程”,造成严重浪费。究其原因,除立项本身缺乏科学论证和存在交通不便、保障不力、后续资金投资不足等客观原因外,没有相应的机制引进和留住人才,更缺乏培养当地人才人力资本积聚的战略举措,造成人力资本积聚始终不能同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相匹配是根本原因。我们应当记取这一经验教训,今天人力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

其次,当前的西部开发与前两次开发技术背景有很大不同,人力资本积聚紧密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前两次的西部开发发生在 50 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可视为我国工业化起始阶段,经济技术基础相当落后。当今世界已进入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高潮期,并开始向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更新的技术革命过渡,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叩响 21 世纪大门,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西部开发在内的任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都要选择相应的经济技术结构。所谓“相适应”,一是同本地区的实际经济技术水平相适应,以我国西部而论,不能盲目追高,各地都要大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同新技术革命潮流相适应,不可视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于不顾,固守陈旧落后的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靠什么?人才是关键成为共识,而人才只能从人力资本不断积聚中来。然而实事求是地估量,高新技术产业西部除少数地区可成长为主导产业外,多数则难以做到,只能发展以中间技术为主体的传统产业,或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相结合的较先进的技术产业。无论发展哪种产业,有一个基本

的观点是必须明确的: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在不断提高。据估计,科学技术在经济成长中的贡献率,已从 20 世纪初的 20% 左右上升到中期的 40% 左右,目前已上升到 80% 左右。西部开发建设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和不断发展壮大,必须提高科技的含量和贡献率。这就不能不求助于人口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求助于人力资本的积聚。一个有胆识的领导者 and 决策者,应当在西部开发中树起优先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旗帜。这样做表面上暂时发展慢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上得不够多;实际上通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聚而增强发展后劲儿,从长期观察将持续推动开发的不断深入,发展反而要更快一些。在这方面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77 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在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他毅然决然地首先抓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将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积聚放在首位。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保证了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对人力资本追加的需要,如今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基本的发展战略确定下来,“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谁能从本质上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解决,确保人力资本积聚的不断增长,谁就能在未来的开发建设中赢得主动权,不断将开发引向深入;谁仅仅将其视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实践中只是抓住项目和投资不放,谁就会在未来的开发建设中暴露出后劲儿不足,甚至受某些效益不佳项目拖累而举步维艰,难以赢得继续发展的主动权。

3. 人口决策选择。人力资本在西部开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加速人力资本积聚也就成了西部开发战略中的关键。如前所述,总体人力资本积聚量等于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乘积,由此提出西部开发要不要伴随大量的人口增长,包括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和外来流动人口的机械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如何处理?等等。故本文从人口变动角度,探讨西部加快人力资本积聚的人口学思路。这一思路的基本点是:西部开发不需要伴随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相反还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同时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和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

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开发与控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角度观察,控制人口增长是维护和发挥西部人均自然资本优势的需要。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总体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环境破坏相对较轻,同“地广人稀”密切相关。1998 年全国人口密度(人/ km^2)为 130,西部地区为 52,其中新疆 10,青海 7,西